

鲁迅上海文化观的历史启示初探

梁伟峰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鲁迅对上海文化的建构主要以批判性、否定性姿态作出。对道德感情的偏执和对崇高话语的坚持,造成了鲁迅的批判上海文化话语的切入角度之“狭”,而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洞悉又导致其批判上海文化话语的切入程度之“深”。鲁迅的上海文化观为后人审视上海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鲁迅;上海文化;上海;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09)01-0068-04

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总体来说是既彼此制约又彼此造就,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他从未吝惜流露对上海社会文化、社会风气的嫌恶。尤其是在生命后期,鲁迅对上海社会文化的批判是远远大过褒扬的。上海文化是海纳百川、丰富而求新求变的多元文化的整合,是一个自成格局的文化系统,开放和宽容精神使它呈现多元杂陈的景观。近代的上海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系统,始终由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类型构成,近代的上海生活也始终是由各种高低悬殊的生活水平构成。“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1]鲁迅的话语言说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始终具有“鸱枭”意味,他最善于指出大家往往视而不见的真实,在大家喜乐时发出恶声。他一生凡事追求名实相符,最憎恶国人的“做戏”、“自欺”、“大团圆”、“万事闭眼睛”的文化思维传统,而努力在中国培育“认真”、“切实”的根苗。鲁迅对上海文化的建构,主要是以批判性、否定性姿态作出的。从一定程度上说,近代“上海人”或上海文化往往在自身的压抑乃至痛苦中来营造一种富庶、安稳、满足、快乐与优越感,而鲁迅恰恰用他一贯的批判性话语穿透了它们,如同他戳破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孔上的厚厚一层脂粉一样。

近代以来,置身于上海这样一座有着浓厚殖民性、混合性文化氛围的城市,有着民族主义感情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一般中国文化人,受到殖民情境和西方文化的直接冲击,常常会陷入某种伤感。正如郑振铎所言:“这个大都市的上海可伤感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并不敢追逐于自命清高者之后咒骂都市。我们之伤感,乃是半由民族的感情而生,半由觉察了那两种绝异的东西文明之不同而生。”^[2]蒋梦麟曾谈到他到上海后对租界内的外侨的印象:“他们在我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新知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在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3]⁵⁰对殖民者身份意义判断的混乱,实际上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的惆怅,由此带来的是“伤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挤压,使其人格具有了分裂感,而文化冲突和语境冲突,直接导致了这些知识分子身份的错位

收稿日期:2008-11-12

作者简介:梁伟峰(1975—),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感,以及面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重边缘感,这其实是殖民情境下移民心态的某种复杂表现。鲁迅作为文化移民,在上海殖民性情境和中西文化混合、冲突的语境中,此种价值上的困窘或许有之,但在他那里,处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重边缘地位并未使他陷入感伤。相反,他以其宏大的“都与我有关”^[4]的生命关怀和“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温饱”^[5]的人类意识,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一般的中西文化冲突和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冲突语境的超越,他孜孜以求的,是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外,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6],也即是不做奴隶的时代,从而对于上海的城市文化总体上采取了一种严峻审视、批判的态度。从根本上看,鲁迅的思想斗争矛头对准一切奴役人、压迫人的对象,包括外国殖民者和本国权势者,而从不偏废。他有坚定而深沉的民族感情,却也有宏大宽广的人类意识。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却绝非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说到底鲁迅是复杂而丰富的,任何单向度的诠释都无法把握。

上海文化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活跃的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走向有着先导性的意义。不过,由于上海的崛起和发展在近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有着唯一性和超前性,因而上海文化固然活跃,但在乡土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包围下,在上海这个“文化孤岛”,上海文化的作用、力量、地位又常常受到限制。它固然被理解为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的钥匙,却也常常被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特例”,它对中国整体的渗透力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强。“被包围”的“他者”处境决定了上海文化和中国乡村文化处于对峙状态,任何试图根本性和全局性地挑战、改变后者的尝试,都十分困难。

鲁迅对于上海文化作为文化类型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显然是没有加以强调或者说估计不足的。鲁迅对上海文化的关注,以把它嵌在中国文化肌体上作为前提,而非把目光“专注”于上海和上海文化一隅。对上海这片热土孕育出的中国最为发达的市民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鲁迅较早予以关注。但由于上海的由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滋生出的病态人格、社会弊病,在广大的中国内地乡村世界并未造成非常普遍的渗透和影响,鲁迅的正面之敌仍然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相关者,因而鲁迅在评价上海文化这一方面并没有获得整体性地转换文化观察视角的契机。至少

他对上海文化的批判总体上说还是从属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在鲁迅意识里他对上海文化的关注并未获得多少相对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独立性意义。

二

鲁迅主要从他的注重改造“国民性”、关注人性自由、国民人格重建的视角观察和衡量上海文化,而基本没有从商业经济层面、市民生活、公共事务参与层面的变化去肯定上海文化的近代性、先进性和必然性。他作为一名对民族未来有着深广忧虑的文化巨人,对上海文化的理解首先是落实到道德—人格—心理层面上的,他必然对上海文化的殖民性、中西混合性、商业性、世俗性带来的人的精神的畸形和病态最为敏感,也最为焦虑。鲁迅侧重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人格、“国民性”、中国社会的“老谱”的关系来观察、诠释上海文化,其深刻处在此,但局限处也在此。鲁迅对上海文化的诠释层面相对单面化,缺乏对上海文化放入人类整体文明线索中的全面考察,缺乏对上海文化的近代意义、先进意义的超出于道德层面的确认。或许在鲁迅眼中,上海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恶疮,上海文化嵌在中国的肌体上,只是让这个早就长有恶疮的美人身上增加了一个恶疮而已。

30年代鲁迅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崇高话语。这种崇高话语注定不会与注重实际利益、充满功利空气的上海社会的市民文化氛围和洽相容。作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性的向往者,鲁迅始终秉持知识分子崇高话语的事实本身,透露出他作为近代中国新知识分子身上无法完全摆脱的乌托邦性。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批判,为上海社会的自我反省提供了一种精神参照,但鲁迅对崇高的追求在上海社会从来不具有普遍性,对崇高的追求也代替不了上海社会生活本身。这可以以瞿秋白30年代书寄鲁迅的诗句“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为参照来加以说明。诗句把流行上海的跳舞等“摩登风气”与革命者所要面对的“刀丛”相对,隐含谴责上海一般市民没有勇气面对“刀丛”而群趋“摩登”之意,反映了瞿秋白操持一种对上海文化责之过严的苛刻评价标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是崇高的,他可以为上海社会立一个勇赴“刀丛”的精神和价值的参照系来警醒起懦、激励人心,却实在没有理由用这个标准要求一般上海市民。“刀丛”和“摩登”之间,并非纯然简单的一白一黑、一

善一恶的关系,未能勇赴“刀丛”的广大的“摩登”上海市民,他们的精神色调或许是灰色的,但并不意味着谴责他们的合法性是完全的。对勇赴“刀丛”的礼赞无法取代上海市民的“摩登风气”,就在于“摩登风气”就是上海市民生活本身,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无独有偶,鲁迅的诗作中也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等表现崇高性的句子,可以与他的“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等表现上海市民的凡俗性的诗句相对,同样传达出试图用一种崇高话语来对上海社会作普遍性要求的思维。在这种对上海文化责之过严的倾向上,鲁迅同瞿秋白等左翼文化人是一致的。

鲁迅始终是一位有着极强道德感的文人。“越是纯洁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越容易陷入道德偏执,越容易以一种道德优越感审判世俗世界。……而他们这种强烈的思想偏好也往往使他们丧失了对别人思路与立场的理解能力。”^{[7]215}这一点鲁迅也并非能够完全例外。从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批判,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的道德化的倾向乃至某种“道德偏执”的影子。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批判,固然有着为他人所不可比拟的深刻,洋溢着为被欺压者立言的道德义愤和道德感召力量,但也确实有因较多粘滞于道德层面的苛求而带来的片面性。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中人的精神处境,鲁迅基本上还是把它归在“秽区”、“势利之邦”、“危地”、“下流之地”、“流氓世界”等上海的道德“罪恶”主题之下并予以痛责。“城市文化批判中的道德眼光(这种眼光今天也仍不陌生)相当程度上来自乡土社会培育的道德感情。”^{[8]200}除了鲁迅所秉持的左翼文化意识形态之外,“乡土社会培育的道德感情”也促成了他对上海文化的道德评价的偏执。而这样的道德感情与眼光当进入某种偏执境地后,无论如何会妨碍他对上海文化探究的深入。

三

如胡秋原在20世纪30年代所言,鲁迅“有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最好的坚强与洁癖,他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虽然狭,然而深”^[9]。鲁迅反抗现实意志的坚强与不苟且的道德洁癖,加上他的人道情怀,使他的上海文化批判显现出切入角度的“狭”与切入程度的“深”来。对道德感情的偏执和对崇高话语的坚持,造成了鲁迅的批判上海文化话语的切入角度之“狭”,而鲁迅宏大的生命关怀与人类意识加上他对中

国传统文化、人格的透彻洞悉,又造成了他的批判上海文化话语的切入程度之“深”。这种落实到道德—人格—心理层面的剥皮见骨的“深”的一面,为同时代人所不能及,也为后来人对上海文化的审视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具有充分的启示意义。

造成鲁迅对上海文化批判的切入角度的“狭”的原因,除了他对道德感情的偏执倾向和对崇高话语的坚持因素外,也与他上海时期非常有限的社会实践和相对狭窄的社会观察视角、渠道有关。受客观情形所迫,上海时期的鲁迅十年内基本上都过着半匿居的生活,一直处于上海市民生活的边缘,并未真正融入上海市民的生活洪流中去。他接触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有限的一些报刊,日常来往的信件,再加上不时内山书店的漫谈,成为鲁迅在上海与外界沟通、接受上海城市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在30年代与他有很多直接交往的曹聚仁曾谈到鲁迅的生活圈子和生活经验问题,他说:“鲁迅的社会圈子,本来是很狭小的;他的生活经验,也是很单纯的;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也都是这一小圈子中人。这一小圈子,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属于文人方面的多;和他接近的青年,也都是对文艺有兴趣的(他和教育界人士的关系也并不多)”,“他的广大视野,乃从历史中来;他对于过去中国的了解,比当前中国社会深刻;诚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看透了过去的中国,也就看透了当前的社会。但当我们进一步解剖分析当前现实社会,就会明白鲁迅的眼光,也只是一方面的。他所揭开的疮疤,乃是属于知识分子的”^{[10]176-177}。曹聚仁的鲁迅对“当前中国”的了解比不上对“过去中国”的了解的说法,或许尚要商榷,但他认为鲁迅对社会的解剖分析受到生活的圈子和阅历、眼界所限,“眼光只是一方面的”,却非常中肯。事实上,这一点鲁迅自己也一直是承认的,对自身经验的有限性的体认,从《呐喊·自序》开始,鲁迅就一直是比较自觉的,他的“反抗绝望”思想,就是以这种体认为重要前提的。城市的形象,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人与所在城市之间的心理联系,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性。鲁迅在上海的交往圈子以及城市社会实践、生活经验的广泛程度、与社会沟通的顺畅程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程度,都比较有限,加上自身知识结构、思维定势的规定性,决定了他对上海文化的观察和切入角度偏于“狭”的一面。

30年代,柳亚子曾作旧诗书赠鲁迅,云“逐臭趋

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其中“能标叛帜即千秋”一句,可以当作对鲁迅批判上海文化的意义的极好写照。鲁迅对上海文化具有的建设性意义,正是从他对上海文化的批判性、否定性评价得出的。在30年代上海的殖民、市民、商业、世俗精神甚嚣尘上、向上海社会各层面渗透的时候,鲁迅以其宏大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关怀及理想主义精神,对中国人的道德—人格—心理建设高度关注的自觉意识,对上海文化举起反叛旗帜,意义是绝对不容低估的。

有研究者认为,“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发展,必将发展居住者对于居住地的非归属感”,而“‘出入之间’,不完全归属、认同,将越来越成为城市人普遍的文化境遇”。^{[11]13}如果说因此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批判姿态比起当时及后来人来说尚无怎样的突出之处的话,那么,把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批判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看,他通过对上海文化的批判体现出的在近代化过程中对“人”的重视、对“工具理性”之外包括“价值理性”在内的更广阔内容的重视,绝对是富有历史深度的。近代化是一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漫长而又理性化的过程,是涉及广义文化诸层面的复杂历史变迁,而“人的现代化”是近代化这一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进程的核心题旨。人的近代化,“包括人对新技术、新艺能的掌握,但又决不局限于此,它还有‘工具理性’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内容,这便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水平和精神境界,其内核是价值

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12]。即使是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社会转型,也必须伴随着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应该定位在“文化重建”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是把握到了建构上海文化的最深刻层面的。

参考文献:

- [1]鲁迅. 墓碣文[M]//野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2]郑振铎. 影戏院与“舞台”[M]//上海:记忆与想象.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 [3]蒋梦麟. 西潮·新潮[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4]鲁迅. 这也是生活[M]//且介亭杂文末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5]鲁迅. 北京通信[M]//华盖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6]鲁迅. 灯下漫笔[M]//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7]李书磊. 1942:走向民间[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8]赵园. 北京:城与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9]胡秋原. 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J]. 读书杂志,1932(1).
- [10]曹聚仁. 鲁迅评传[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 [11]冯天瑜. 序[M]//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Exploring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Provided by Lu Xun's Outlook on Shanghai Culture

LIANG Wei-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Lu Xun's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culture is mostly negative and critical. Although from a “narrow” perspective, Lu Xun's critical language demonstrates his persistence in ethic feelings and stro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anwhile, his “profoundness” displays his penetrating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ersonality, and his outlook on Shanghai culture provide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his later generations to better study Shanghai culture.

Key words: Lu Xun; Shanghai culture; Shanghai; criticism